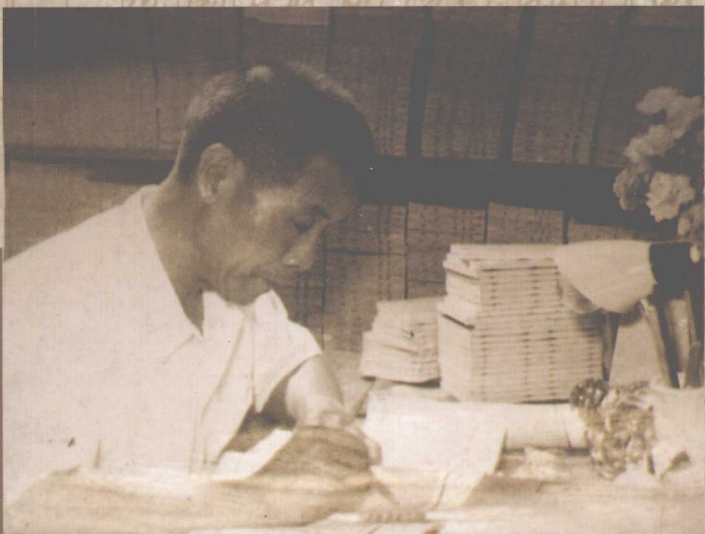


黄冕堂晚学集

古史文录

学林漫步

◎黄冕堂 编著



周 齊 魯 書 社 大尺为步，古人一百平方步为一亩

有 其 河 石 亦 同 略 便 以 治 所 以 少 尺 为 步 外

陳鳳石先生集

古史文苑

平林遺集

（清）陳鳳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山东大学硕果基金资助出版

黄冕堂晚学集

古史文录

学林漫步

◎黄冕堂 编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冕堂晚学集/黄冕堂编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333 - 1914 - 4

I. 黄… II. 黄… III. 中国—古代史—明清时代—文集
IV. K248.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283 号

黄冕堂晚学集

黄冕堂 编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7

字 数 302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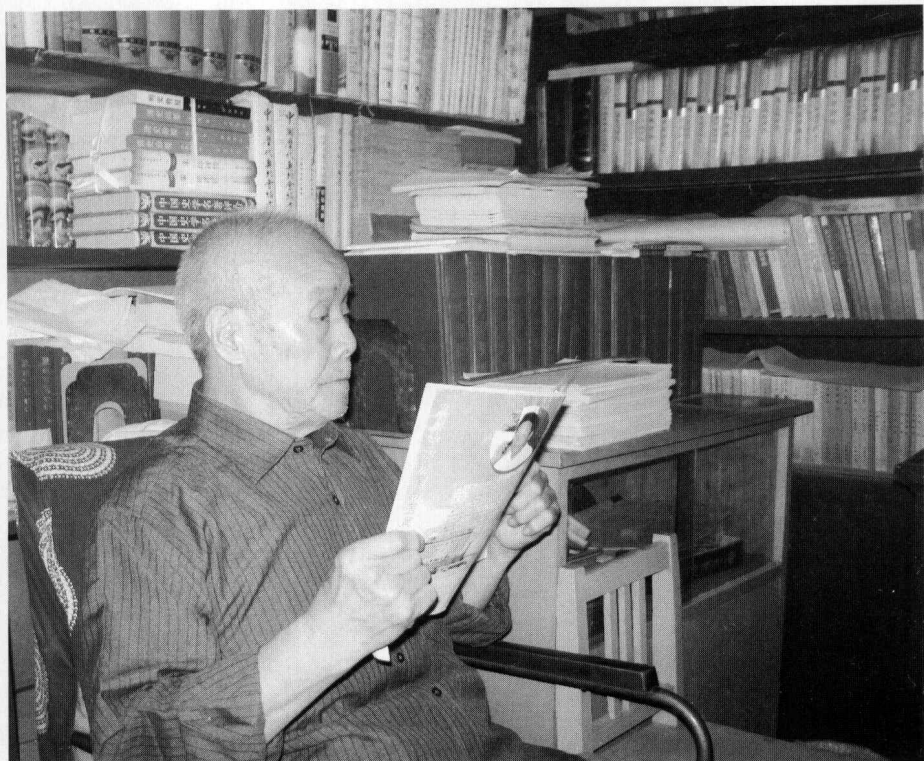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1914 - 4

定 价 32.00 元

作者简介

黄冕堂1924年5月生，湖南湘阴人。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并留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并兼任山东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已出版《明史管见》、《清史治要》、《朱元璋评传》等专著及论文40余篇。



作者近照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作者錄孔子格言自警

前言

个人自1990年退休后,除出版《朱元璋评传》一书外,还陆续撰写了28篇杂稿。其内容包括四个大的方面:(一)中国历代物价问题。(二)朱元璋的思想研究。(三)明清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四)学林漫步。这些杂稿部分篇章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集刊》等杂志上刊发过,物价问题稿件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2003年考虑上述已刊发的稿件散乱在全国多种报刊上,年代久了,容易导致佚失现象发生。因此,决定将上述已发和未发的全部文稿集结成书。书名定为《中国历代物价问题通考及其他》,并获准由山东大学硕果基金资助出版。随后进一步思量:该书以物价一项内容命名,实际其中专叙物价的篇幅仅够总篇幅的一半,故决定将全稿按内容差异分作两部书同时刊出。其书名分别为:《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和《黄冕堂晚学集》。下面将《黄冕堂晚学集》内所涉及的若干问题作些说明。

朱元璋是有明一代开国英主,“洪永盛世”给予后代历史的各方面影响是巨大的。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主要有以下数端:其一、好学不倦、自学成才和勤学终老的钢铁意志。朱元璋原来仅是一个初脱文盲的看牛娃和游方僧,从参加反元起义直至死前的半年,天天手不释卷,数十年如一日,卒成一代英主兼学问家,《四库全书》以显著位置收有《明太祖集》20卷。书中诏、制、诰、书、碑、志、序、赞、

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应有尽有。刘基、宋濂、顾炎武和清代史学方家赵翼等众口一词，对朱元璋的文章极为赞赏。刘基曰：朱“万机之暇，作为文章，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言雅而旨远”。宋濂曰：朱元璋为文“挥洒之际，思若渊泉。顷刻之间，烟云满纸，有长江大河一泻万里之势。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乔岳，未足喻其高也。雷霆流行，未足喻其变化也”。赵翼曰：“明祖以游丐起家，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明太祖集》附录，《廿二史劄记》卷三二）。其二、博学多师，不主先入，择善而从，不善则改之。朱元璋的思想主要继承儒学传统，但对释道二学亦不排斥，其文集中一再强调“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认为儒释道三祖有殊途同归之妙。朱元璋对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和程朱理学都有所继承，但主要继承的是孔子和朱熹的学说。朱元璋对各家各派丰富的军事典籍也像对儒家经典一样精心诵读，并创造性运用于实战。宋濂谏曰：“二典、三谟、大经大法俱在。”朱元璋以文武二途，各有所用反驳之。其三、尊天命，尽人事。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天命靡常”。“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朱元璋由青年时期的“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进一步确认“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民心所向，不论上天有无反映，笃定就是天命所归。民所是者天是之，民所否者天否之。这种一切以民为依归的天命观实际是导源于先秦儒家的“天民”论。《左传》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引《尚书·泰誓》篇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主于民，蕴含了天从人愿和人定胜天的奥旨，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和“人能弘道”的天命观也是一脉相承的。其四、崇实贱虚。无问群臣百姓，上上下下，都应弃浮夸，斥虚诞，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人人都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即使祭祀百神一类虚妄难测之事，也要务求收到实效：或诚惶诚恐，祈祷上天眷顾，消灾弭孽，降吉降祥；或通过祭祀活动，倡导某种良好的社会风气，造福万民。其五、重

农而不贱商新理念。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以副养农,使明代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六、有教无类。用人唯贤唯才,不拘一格。唐以后各王朝大都通过科举这一独木桥选拔人才,但洪武31年中,科举、荐举、征辟、选用监生(国子监学生)等各种选才途径都采用过。《明通鉴》曰:洪武时期“以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最早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一节提出来的。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已经把前者的要素游离出来。”又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世纪十五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若干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词最早是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三节中提出来的。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由此看来,经典作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准确含义是指: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开始在旧的封建经济结构母体内孕育萌发的一个胎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襁褓时期是晚至16世纪才到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早在1840年与西方爆发鸦片战争以前业已存在,但资本主义萌芽从何时开始萌发,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弄清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准确含义以后,还有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必须解决: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二、资本主义萌芽遵循着怎样的道路从封建结构母体内产生出来;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标志是什么?

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条件是指:封建农奴制度(东方某些国家主佃隶属关系)、行会制度的解体和城乡特别是农村小商品生产的

阶段性发展。在众多城乡小商品生产者内部出现新的贫富分化浪潮（不是个别现象）。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是怎样从封建经济结构母体内产生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中说：“由封建生产方式的推移（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移），是二重地进行的。生产者（指个体农民或手工业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即自足自给的封建经济），与中世纪城市产业在行会中结合着的手工业相对立（指大量进行小商品生产），这是现实的革命路。但或者是商人（指封建社会内旧的富商大贾）直接支配生产。这后一条路，虽然在历史上极其厉害地当做过渡（指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来发生作用，……但它本身却是这样少地唤起旧生产方式的革命。”就是说：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推移或过渡是遵循两条道路前进的。一条是“现实的革命的路”。即由城乡个体小商品生产者内部发生新的贫富分化，少数人通过剥削雇工和经营小商品生产发家致富，在城市中成为新型“协作”或“手工工场”业主，在农村则成为西方的租地农业家或东方的“富农”、“大农”。一条是改良性质的道路。即由旧的富商大贾把资金投向产业（过去把资金投向土地，或放高利贷），直接组织手工业或经营农业。

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标志是多方面的：一、农奴制度和城市行会手工业的解体。明代农村地主与佃农出现主佃两业或三业的新体制，地主仅拥有土地所有权，佃户或其他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甚至可以将经营权自由转让，因而产生富农和租地农业家。城市中，官营工业激剧衰落。工匠可以“以银代役”，苏州和江西景德镇瓷业出现“官搭民办”或“官搭民烧”。这些新生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二、明代个体农民（佃户、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因广泛经营小商品生产而在自己队伍内部发生新的贫富分化浪潮，少数人发家致富，成为

各种手工业大作坊主或农村的“富农”、“大农”。多数人贫困破产成为劳动力出卖者。具体情况见《论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和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一文。三、旧商人因受上述小商品生产大发展的影响,把资金从过去投向土地当地主兼高利贷者转而投向小商品经营。这条改良型的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道路,虽然对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包袱,但在“历史上(指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极其利害地当作过渡来发生作用”(见《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论明代商业资本的二重性》一文叙录了明代有不少旧商人改变经营方向的状况。四、大量雇佣劳动者的出现。这类雇佣劳动者的特点有两个:一是自由的一无所有,既没有生产资料(如土地、生产工具),也身无分文,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二是其人身是绝对自由的。雇工只出卖劳动力,与主人之间,只存在金钱关系,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依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从明代后期开始,官方文书上承认:社会上出现了众多与“雇工人”有别的“无主仆名分”雇工。但细察明后期的文献仍然发现一些矛盾:即从纯官方文献看,上述“无主仆名分”的雇工(“凡人”)仅指“短雇日月”的一类卖工者。凡与主人“立有文券,定有年限”的长工,仍属“雇工人”身份。另一方面,从《沈氏农书》、张杨园的《补农书》一类私人著述看:明末社会风气大变:经济上,“登垄逐末,黜素崇华”;政治上,主仆名分解体,“僭礼逾分,无所严惮”,“朝秦暮楚,恬不为怪”,“名分荡然”,连长工也“去留随其自便”。到了清代,虽然仍有不少“雇工人”在上流社会或中层活动,但各种“无主仆名分”者(包括长工、短工)比比皆是。《清代“雇工人”问题考释》和《清代“无主仆名分”雇工通论》二文,对此有详尽论证。五、明代货币地租的萌生和清代货币地租的大量涌现。详情见《明代农民的自由化倾向》和《清代货币地租概论》二文。

学林漫步部分探讨了两个问题。一、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

下研究历史。详情见《记赵俪生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一文。

二、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如下优良学风和师德很值得继承和发扬:其一、“崇德”和“修业”并重。坚持品学兼优,警惕“重才轻德”偏向。其二、教学和科研并重。一位学者的成就,最终表现在出人才和出成果两个方面。人们当然期望二者都成就辉煌。但相比之下,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传承学术本身和促进国家民族多方面发展,都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得熊掌者也。”这段话很值得深思。所以,一位教师首先必须把教好书和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天职。在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搞好科研。赵俪生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成就非凡,其精神和经验很值得学习。其三、博学多师、兼容并包。对各派学说不抱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其四、对自己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对后进、青年诲人不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其五、坚持上学下达,“多学而识”,博学精思。古语云:“记问之学,自愧学肤。”“记问”方法是下学(初学)阶段功夫,不是高深学术。但孔子既曰:“多学而识”,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满足于“记问”初学是不对的,但反对“记问”而去寻求所谓“上达”也是危险的。其六、坚持金字塔式的修学道路,培养一专多能人才,克服形形色色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倾向。其七、坚持学术公器不为私欲所害,坚持厚积薄发,反对浮名皆得,粗制滥造。其八、继承与创新并重,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反对陈陈相因,不思进取。

黄冕堂

2007年6月30日



杨师向奎先生(左4)和夫人杨师母(左5)带其孙女来济时与学生合影,右6为作者。



2000年7月,作者进京参加杨向奎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会后与在京校友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



学友张传玺(北
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及夫人丁丽君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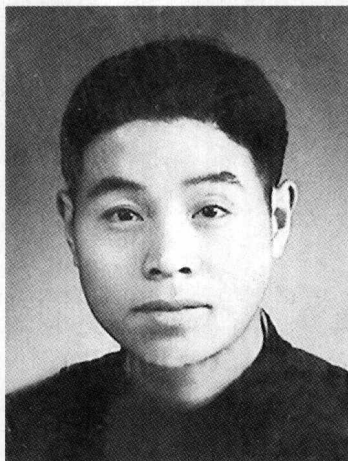
学友韩大成(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及夫人
杨锡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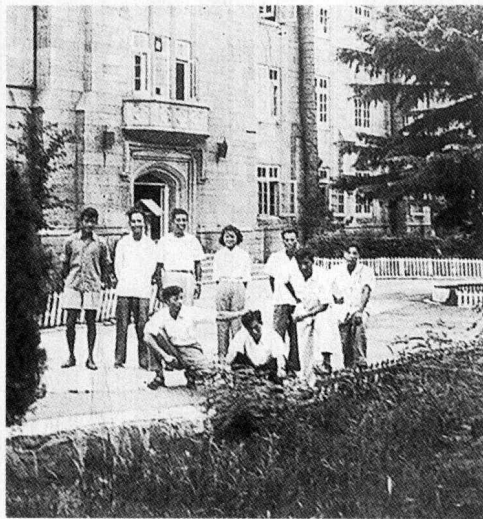
学友李华(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及夫人李佩芬合影



学友臧乐源(山东大学教授)
及夫人乔植英合影



作者 1952 年在山东大学毕业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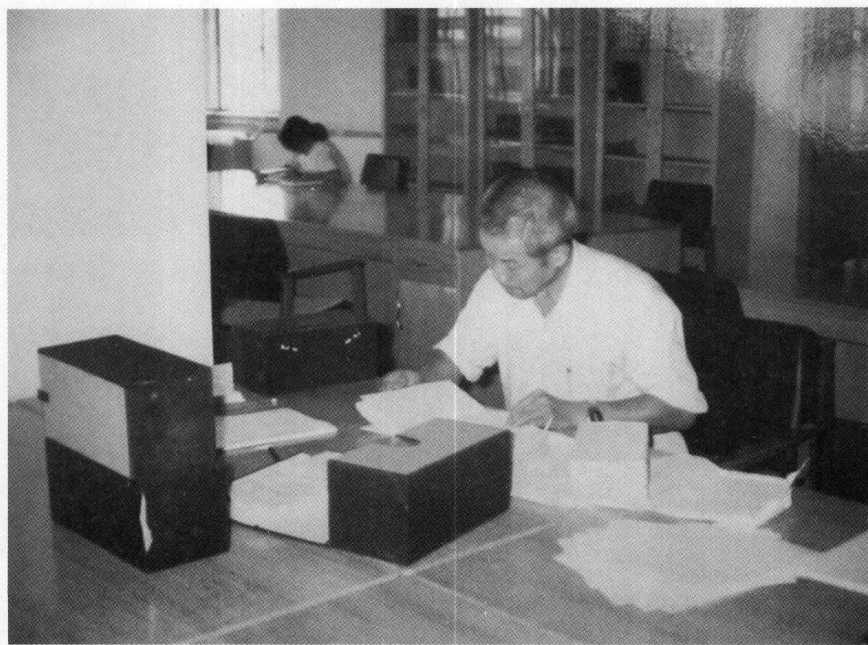
1950 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与同学合影于青岛鱼山路山东大学校园,右一为作者。



作者与湖南高中同学陈士譔
来济南时的合影



1985 年应邀出席香港国际明清史研讨会时代表留影,左九为作者。



作者在北京一史馆阅抄档案